

梁啟超的《新民說》

—如何評價〈論私德〉—

木山 愛莉

前言

梁啟超(1873--1829)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也是戊戌變法運動中具有代表性的啓蒙思想家。戊戌變法失敗后，他逃亡日本，在日本度過了 14 年的逃亡生活。在日本期間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積極以言論開民智，為造就近代國民作出了貢獻。為了救亡圖強，使中國成爲一個近代化的國家，提倡首先要改變中國的舊思想、舊意識，因爲國民的思想意識不改變，舊中國也就無法改變。認識到在建設近代化國家的同時，如何造就新時代的國民，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的課題。

梁啟超提倡的造就一代新型國民的核心思想《新民說》就發表在他在日本創辦的《新民叢報》上。《新民說》共 20 節，從 1902 年開始連載四年。〈論私德〉是《新民說》中的第 18 節，是他通過 1903 年遊歷美國對中國人的國民意識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后發表的，可以說是一篇具有特出意義的論說。然而被認爲以提倡公德爲主的《新民說》增添了這篇〈論私德〉，引起了人們對〈論私德〉評價的爭論。學術界許多人把〈論私德〉的發表，認爲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轉向或者倒退¹。

¹ 主要有以下論說。

張朋園於《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年），頁 163。指出：“光緒 29 年以前的任公與以後的任公，其言論幾若判作兩人”。意在梁啟超從激進返回保守，把梁啟超發表〈論私德〉看作是思想上的後退。

與張朋園持同種看法的是小野川秀美。“1903 年遊歷美國回來后，從那時起主張逐漸開始走入後退傾向。”而且特別強調指出：“前一個年度開始連載的「新民說」雖然以公德為開端，但是卻逐漸將核心轉入私德，提倡沿著儒教道德培養私德。而且更後退一步，提倡開明專制”。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書房，1969 年），頁 272-275。

狹間直樹發表的〈『新民說』略論〉認爲〈論私德〉是梁啟超的「轉身」（轉向），所以對梁啟超以後發表的《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73-75 號）指出：“梁終於捨去了那一立場（中國之新民的立場），把從底層培養新民的方針，以從權力方面進行改造、革新來代之”。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 年），頁 86。

本稿試就如何評價這篇具有特出意義的〈論私德〉作一些論述。

一、發表〈論私德〉的背景與目的

梁啟超最初發表《新民說》時確實沒有論述私德的打算，這一點在《新民說》第五節〈論公德〉篇的最後有明確記載：

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羣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¹。

《新民說》主要目的在提倡公德，是因為面臨瓜分危機的中國要屹立於世界，國民就必須要具有公德。梁啟超對當時中國國內狀況以及世界形勢做了分析，第一點是對中國國內而言，指出沒有能夠承擔建設近代化國家的國民，無論是官還是民，人人責人不責己，人人望人不望己，這不僅是國家建設上存在的最大的問題，也是造就新民需要改進的最大缺點。另一點是針對民族帝國主義不斷向外擴張的勢力，而沒有能夠與這些勢力抗爭的國民，政府腐敗、國民散弱，無法聚集民族全體之能力而形成一強大勢力。面對這些現實梁啟超發表《新民說》，主要是為了闡述如何造就中國「新民」，因此重點自然放在了提倡公德上。

然而當他將新民所要具備的公德基本論述完畢後，又不得不主張私德的重要性，並且強調“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²，當然自有他的道理。梁啟超就發表〈論私德〉的理由及其目的明確闡述如下：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託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為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昔賢，言之即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嘵嘵詞費也。乃近年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羣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未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嘻，余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³。

對狹間直樹的梁啟超的「轉身」（轉向）持不同看法的是高柳信夫。參看其論文〈梁啟超の所謂「轉身」について—『新民說』「論私德」とその周辺—〉，《東洋文化研究（4）》，2002年3月，頁1-31。

¹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 6 專集之四》，（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頁15-16。

² 同前註，頁119。

³ 同前註，頁118。

這段話說明了三個問題。其一，梁啟超在發表〈論公德〉時並非不提倡私德。在梁啟超的近代國民思想意識中，從提倡公德的時候一貫強調的就是：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二，認為中國私德不但發達得早，而且先聖昔賢言已圓滿纖悉，無需自己再費唇舌，所以《新民說》全篇主要以公德為主。其三，在發表〈論公德〉時，認為私德當久已為盡人所解悟踐履，也就是說中國人已經具備私德了。而現實並不像梁啟超想象的那麼樂觀，當時中國的狀況是，隨著西方學說、革命思想的普及，留學生以及中國國內的學校時常出現騷動，青年人的腦海裏充滿破壞學說，那些無限制的自由、平等之說的行為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弊害，不但公德建樹不起來，而且私德也遭到破壞。面對這種情況，他不能再沉默，不能無動於衷了。必須要找出辦法控制這種現象的延續。事後梁啟超回想當時情況時說：

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¹。

吐露出他當時的憂慮心情。因為一些人打著自由平等的旗號謀私利，「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力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²。梁啟超看到在彼國高尚醇美利羣的學說，進入到中國被中國的偉大的同化力所埋沒，不但起不到積極作用，而且適得其反。在苦惱中他意識到，「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為力也」³。只依靠公德的理想建樹不了國民的公德意識，必須要思考怎樣才能把西方的公德正確引進中國，避免公德進而弊害生。經過深思熟慮他的結論是借助私德的力量，而轉為提倡私德。

促使他發表〈論私德〉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之行。1903年1月至10月之間梁啟超遊歷美國考察，〈論私德〉是他在美國考察中以及返回日本

¹ 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辭〉，《飲冰室合集4 文集之二十九》，頁3。

² 同2，頁127-128。

³ 同前註，頁131。

后連續發表的。這次考察同樣使他認識到公德的基礎在私德。梁啟超目睹亡國數千年的猶太人，卻在美國具有一定的實力和地位，並能巋然團成一族立於世界上，更加認識到能在世界佔一地位的民族「則其民族之特色之實力必有甚強者矣」¹。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這個特色實際上就是民族的性質，民族的品格。梁啟超加深了對民族之特色與實力的認識，認為：

盲者不能以視於眾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於眾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眾而忽勇²。

也就是說行為決定於性質，而非決定於環境。他對民族之特色與實力認識的加深不能說是與遊歷美國無關的，是他通過對僑居美國的猶太人與華僑的對比而得出的結論。

梁啟超認為，要想研究中國人的性質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觀察與其他國家的人生活在同一法律下的中國人，美國遊歷為他提供了觀察研究的場所和機遇。他在舊金山對華人社會進行調查，根據當地華僑組織的特性分為 7 個種類，做出了分析，針對中國人的性質歸納出以下四項³。

① 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這是梁啟超認為中國人雖然身居以個人為單位的美國社會，卻仍然毫無改變地繼承保留著中國社會以家族為單位的構造，而且大多數的組織都是以地緣等為基礎的結社而做出的結論。不言而喻，這種結社與在公德的基礎上成立的政治團體是截然不同的。梁啟超認識到，把族民變為國民的改革首先要從每個人的意識改革開始。

② 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指出村落思想過於發達，就會成為建設國家的一大阻力。其根本問題是，舊金山的華人社會只能以一族為最上之團體，而不能以國家為最上團體，是沒有國家思想的表現。

③ 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梁啟超目睹到在全球可能沒有比舊金山的華人社會更凌亂、更無秩序，與當地的美國社會簡直無法相比。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梁啟超所說的專制，並不是以個人的絕對權力統治一切的專制

¹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飲冰室合集 7 專集之二十二》，頁 36。

² 同 2，頁 119。

³ 詳細內容請見前註 7，頁 110-126。

政體，而是以道德為基準所採取的制裁。是針對舊金山華人社會秩序混亂，行事無規則、無約束而下的結論。

④無高尚之目的。梁啟超認為這是當時中國人最大缺點之一。因為人有高尚之目的才能日日有進步，然而在彼國，高尚之目的來自於他們的好美心、社會之名譽心、宗教之未來觀念，此三點是西方精神文明發達的根本，也是中國人所不具備的。指出中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具備西方精神文明發達的根本。

以上所指摘的問題，都與梁啟超以前曾經多次指出的中國人的缺點是一致的。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華人雖然與美國人一同身居自由民主國家，而仍然難改中國人身上的缺點，沒有養成美國國民所有的性質，也就是說本質不會因他人的影響而改變。另一個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即使不生活在本國而生活在其他國土，其思想意識也不容易得到改變，也就是說本質不會因環境影響而改變。梁啟超意識到本質的重要性。同時他還在華人與猶太人之間看到了一個很清楚的對比，那就是身居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國家的國民，可以得到正反截然不同的結果，其根本也是在個人所具有的性質＝本質的問題上，認識到某件事能夠得到某種結果是與個人所具有的性質緊密相關的，也就是說與私德緊密相關的。

〈論私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認識下發表的，主張私德主要強調的是，要想建立起公人格，絕不能忽略對個人人格的培養，這纔是梁啟超論述私德最重要的目的。〈論私德〉不僅是道德的問題，同時還是為了解決為什麼公德在中國難以立足的問題，包含有培養人格與社會改革的相關的問題。

二、私德與公德的關係

公德對梁啟超來說可以說是他在日本接觸的一個新的概念，在對公德與私德的定義以及理解上，梁啟超的認識過程有一定的背景，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和中江兆民的影響。而且其影響不僅是對公德和私德的定義上，在他的其他論述中，很多都是來自福澤諭吉的著作¹以及中江兆民的翻譯作品。福澤諭吉對私德及公德的解釋是：

¹ 針對這一點石川禎浩：〈梁啟超と文明の視座〉，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頁113，有詳細論述。石川禎浩就梁啟超的《自由書》與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做了詳細的比較。

第一、貞実、潔白、謙遜、律儀等の如き、一心の内に属するものを私徳といい、第二、廉恥、公平、正中、勇強等の如き、外物に接して人間の交際上に見わる所の働を公德と名く¹。

福澤諭吉把個人内心的美德劃分為私徳，把與外物接觸，與他人交往時需要的道德劃分為公德，而梁啟超也解釋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徳，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²，在公、私劃分上與福澤諭吉是十分相似的，不過在對公德的認識上兩者有所不同。從梁啟超對公德的詳細解釋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公德比福澤諭吉所說的似乎屬於私徳的廉恥、勇強，更具有社會性，重點在家庭、社會、國家等與社會構造相關的倫理道德，強調了公德最大的特點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會，是利羣。他認為邊沁所定的使人增長其幸福者為善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標準，引而道出他所理解的公德的具體概念：

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為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徳³。

這恰恰又與中江兆民在《理學沿革史 論公利私利》中對公與私，即公德與私徳的介紹一致，

利の広く人に及ぶは公たり，独り一身に止まるは私たり⁴

兩者闡明了人人獨善其身以及人人相善其羣的內容，強調利羣也就是善羣，就是使人增長其幸福。

梁啟超他在所發表的《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的最後一頁記載了12冊引用書目，其中也明文記載著中江兆民的《理學沿革史》。由此可見當梁啟超接受公德這一新概念時，以福澤諭吉的劃分方法對公德與私徳做出了區分，又通過中江兆民翻譯的日語，吸收邊沁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標準，使人增長其幸福，要把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

宮村治雄指出了「梁啟超の一連の『西洋思想家論』において、『理學沿革史』のもつ比重の大きさ」¹。這在他對公德、私徳的認識與理解上也表現出來。

¹ 福澤諭吉：松澤弘陽校註《文明論之概略》（日本：岩波書店，1995年），頁119。

² 同2，頁12。

³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飲冰室合集 2 文集之十三》，頁31-32。

⁴ 《中江兆民全集 第11卷》（岩波書店，1984年），頁25。

梁啟超的《新民說》詳見其內容，無論是第六節〈論國家思想〉指摘的中國人無國家思想，還是第八節〈論權力思想〉、第九節〈論自由〉指出的無權力思想，不知自由，以及第十節〈論自治〉指出的不能自治，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大點，就是因為中國人只知有自己而不知道國家是什麼導致出的國民不能自治自助和可悲的奴性。針對這些問題，梁啟超認為最大的原因是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開始大力提倡公德。

梁啟超對道德的認識是，「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即當道德以行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公與私之分，也就是說以人格（梁所說國民之人格）表現出來，或者以國民資格表現出來。以人格表現出來的屬私德，以國民資格表現出來的屬公德。並強調作為人格表現出來的部分也就是私德，是古今中外沒有區別也不會變化的。

梁啟超論述公德時所要強調的是，中國固有道德的一部分以喪失人格的形式表現在國民的奴性以及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的行為上。強調當中國面臨被西歐列強瓜分的危機，在要救亡圖存的歷史條件下，只有私德是無法與今日世界競爭的。要使國家屹然強立於世界之中，需要的是能自治自助、獨立自主的國民來通功易事、分業相助，群策群力、捍城捍侮。這些公共觀念都來自於公德，在中國固有的道德觀念中是看不到的。因為中國的舊倫理重視的只是一私人與一私人之間的事情，缺乏一私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梁啟超解釋說「人類總不能遺世獨木也」²，人不可能與世隔絕，必定要生活在與他人交往的社會中，實際上就是在強調公德。然而強調公德並不意味著他否定私德，梁啟超所說的新道德毫無疑問包括公德與私德。梁啟超造就近代國民的思想一貫是：無論公德還是私德都是不可缺少的。梁啟超所說的道德之本體一而已，強調的就是公德與私德，即道德與人格是不可分的。他說：

假如世界上沒有別人·我的『人格』從何表現·假如全社會都是罪惡的·我的『人格』受了他的漸染和壓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個共通的·不是個孤另的·想自己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

¹ 宮村治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学」との関連にお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年6月，頁206。

²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飲冰室合集 7 專集之二十三》，頁17。

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從各個『自己』化合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¹。

幾句話說出了社會道德 — 公德，與個人道德 — 私德的密切關係。梁啟超在論述公德時並沒有忽略私德，而在論述私德時也沒有否定公德的重要性，他的道德觀念中一貫包含有公私兩德，提倡的是必須要具備公德與私德的新民。

但是，在提倡公德不但不見效果，反而背道而馳的現實面前，梁啟超只好暫時放棄一概大力倡導的公德，開始把論點放在私德上，他說：

吾疇昔以爲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種新道德以補助之·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絕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也。²

這是他對在中國建樹公德如何不易的深深感受，認爲需要反思，尋找更適合于當今中國的方法。他的這種想法從他在美國遊歷途中（1903年4月13日）寫給蔣觀雲的義氣高昂的信中可以看到。

弟此行見海外人之熱心，益覺得非轟轟烈烈再做一場，則此身真無顏立於天地。今後誓將去空言界，以入於實事界矣³。

梁啟超所謂轟轟烈烈要做的是，少發表當前實現不了的言論，而多論述當前最急於解決的問題，尋找最適合于今日的有效方法。其方法就是能夠對建樹公德起促進作用的私德。而且這時的私德已經不是〈論公德〉時所指摘的以束身寡過為第一義，養成一私人資格的道德觀念，而是養成通向公德，通向國民品格的道德觀念。是從養成一私人資格的道德觀念，向養成國民之品格的道德觀念的飛躍。

三、以私德為基礎的國民之品格

梁啟超提倡的新民，與舊時代的「國民之上有國家」，即隸屬於國家的國民截然不同，是把國家與國民的立場倒置過來，要讓國民在國家之上，要讓國民黨國家的主人。目的是呼籲人們擺脫奴性，獨立自主。這樣的新

¹ 同前註，頁18。

² 同2，頁131。

³ 梁啟超：〈致蔣觀雲書〉，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12。

民不但要有西方近代國家的國民所具備的「新道德」，同時也要具備培養個人人格的「私德」。兩者的關係是，建設近代國家需要具有「新道德」的近代國民，而具有「私德」的人又是「新道德」的近代國民的根本。這就是梁啟超的國民思想所提倡的「新民」。

梁啟超培養近代國民的思想關注著國民資格與國民品格兩個不可分割的問題。遊歷美國后他更加關注的是國民品格，這與在美國期間的所見所聞是分不開的。如：學校圖書館一例，學生可以自由地把圖書館的書帶出圖書館，但紛失的圖書並非多，就是說在不受任何強制的情況下，而能自覺地將書還給學校，梁啟超從日常中的這種瑣碎小事，看到了美國國民所具有的高度的公德觀念，認識到公德觀念來自於國民品格。通過遊歷美國增加了他對私德的關注，並發表〈論私德〉強調了培養個人德性即國民品格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國民思想後退或者轉向，也並不是打算放棄公德。他明言說：「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輔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後，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也」¹。即使在大力提倡私德時，他也仍然十分重視新道德，但因為擔心在目前的民德下，恐怕公德不能收其效果，所以新道德又不得不求助於國民教育大興，即國民品格成熟后，他陷入了兩者不能兼顧的狀態，只好以入實事界的態度高呼「然則近日所恃以維持我社會於一線者何在乎，亦曰我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²。「在他的思想中，固有的文化在德與智兩方面都提供很有價值的資源」³，表現出他對中國固有文化的自信。

爲了從傳統的道德觀念中尋找出適合於今日最有用的理論，梁啟超對中國歷代民德升降的原因作了分析⁴，得出的結論是東漢時期中國的民德最高尚，東漢民德高尚百分之七十取於儒學，注意到儒學在培養民德上的效用，把最適合於今日的理论設定在儒學和王學之內。

梁啟超強調學問之所以能救世，必須要內有精神存在。「苟無精神，則愈博學而心術愈以腐敗，志氣愈以衰頹，品行愈以詖邪」⁵。當時的中國正處於這種狀況，隨著西方的進步學說不斷傳入，很多人只要自由不要約

¹ 同 2，頁 132。

² 同前註，頁 132。

³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3 年），頁 126。

⁴ 參見〈論私德〉所付中國歷代民德升降的原因表。同前註，頁 128-130。

⁵ 梁啟超：〈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 1 文集之四》，頁 86。

束，只要權力不盡義務，不但公德得不到成立，而且人心更加腐敗，社會更加混亂，就是因為外來思想在中國沒有精神存在的結果。

〈論私德〉中他把這個精神稱為道德之原質。他對西方國家的道德之原質的理解是來自於宗教之制裁、法律之制裁、社會名譽之制裁，也就是說受宗教、法律、社會名譽所監督所約束的。而中國不具備有這些條件，那就應該從本社會中找出，從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尋找，以便中國在引進西方新思想時能監督、約束自己的行為。

〈論私德〉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以破壞來改革社會的問題。梁啟超根據世界各國興隆的歷史，承認改革必有破壞，對破壞持有一定的肯定態度。他對破壞提出了兩種解釋。其一是破壞如同建造房屋，必須是以建設為前提，批判了只破壞不建設的行為。其二是破壞如同治病下藥，必須對症下藥，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指摘一切破壞的謬論，告誡人們不能一併破壞，要有目的的破壞。

今之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此謬言也。吾輩曷為言破壞，曰，去其病吾社會者云爾，如曰一切破壞耶，是將並社會而亦破壞之也。苟一切破壞，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應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¹。

梁啟超對症下藥，指出要一掃中國數千年的舊毒，就應該進行有建設的人為的破壞。而所謂的有建設的人為的破壞，就是在有制裁的自由、無傲慢的自信、利他的利己心基礎上進行破壞。這種破壞是有意識的破壞，效果大，既有破壞又有建設。梁啟超強調的是進行破壞的人必須要具備能夠控制住行為的德性，指出了破壞的行為與德性的關係。

〈論私德〉針對走入極端破壞的人的謬論：建設需要道德，破壞不需要道德進行了反擊，高呼不僅建設需要道德，破壞更需要道德，強調了三者之間的關係，無論缺少哪一方，不但建設得不到實現，就連破壞也無所成立。特別是破壞必須要以德來約束，必須是具有高尚純潔品格的人纔有資格言破壞，行破壞。再一次地強調了建樹公德必須要以私德為根本。

結語

1903年梁啟超遊歷了美國，目的是考察美國華人社會的實際情況，視

¹ 同2，頁131。

察美國社會。遊歷美國 10 個月的時間，不但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而且使他的新民論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在美國期間他繼續連載《新民說》發表了〈論私德〉，這篇〈論私德〉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倒退，還是轉向或者是進步，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本稿以以下兩點評價發表〈論私德〉是梁啟超經過不斷的思索得到的思想上的飛躍。

第一點是，他對私德的高度重視。梁啟超的道德思想一貫是提倡公私兩德兼備的，然而遊歷美國使他對公私兩德兼備的認識有一個新的飛躍，〈論私德〉指出的問題是國民如果不具備私德，公德就有可能得不到完善的實踐，強調了公私兩德的互補互助的關係。梁啟超提倡私德的主要目的是以私德限制公德，防止亂用、錯解公德。而私德的原點是完善的人格。他的這一思想的形成，與遊歷美國是分不開的。遊歷美國使他的新民思想有了新的飛躍。

第二點是，遊歷美國他目睹華人地位極低，而且只有華人受到美國的各種限制。原因是國家軟弱，人民就會遭到歧視，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性質所導致的，他更進一步認識到國民本質的重要性，因為本質可以決定一切，所以需要著重於培養國民品格。

從上述內容梁啟超得出的結論是，私德是公德的根本。〈論私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表的，具有《新民說》的一貫性及新的發展，所以說梁啟超強調私德，並不是思想上的後退或者轉向，而是在他國民思想延長綫上的一個進展，是他改革國民意識論的延續。

參考文獻

- 《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
- 《清議報》，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
-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
-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
- 福澤諭吉：松澤弘陽校註《文明論之概略》，日本：岩波書店，1995年。
- 《中江兆民全集 第11卷》，岩波書店，1984年。
-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書房，1969年。
- 狹間直樹〈『新民說』略論〉，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頁86。
- 石川禎浩〈梁啟超と文明の視座〉，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

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

高柳信夫〈梁啓超の所謂「転身」について—『新民説』「論私徳」とその周辺—〉，《東洋文化研究》第四期，2002年3月。

宮村治雄「梁啓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学」との関連にお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年6月，頁206。